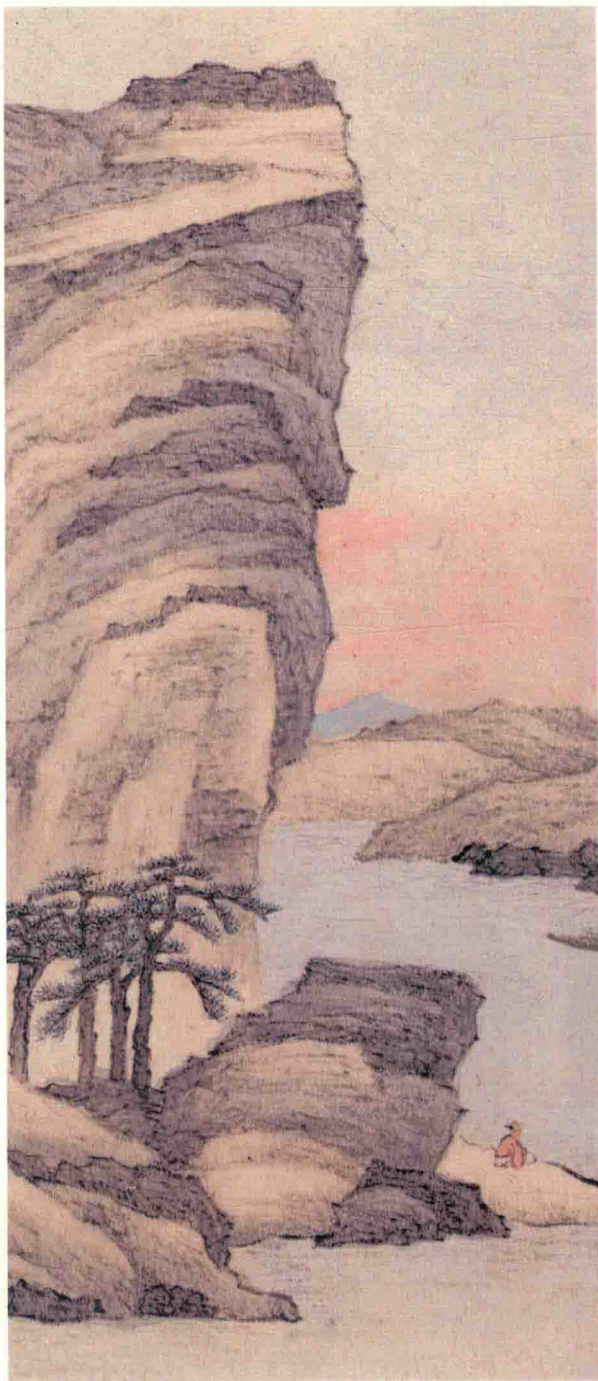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经典诗话

词品

【明】杨慎撰 高林广评注

唐人柳枝词，刘禹锡，白乐天而下，凡数十首。予独爱无名氏云：「万里长江一带开。岸边杨柳是谁栽。锦帆落尽西风起，惆怅龙舟更不回。」此词咏史咏物，两极其妙。首句见隋开汴通江。次句「是谁栽」三字作问词，尤含蓄。不言炀帝，而讥吊之意在其中。末二句俯仰今古，悲感溢于言外。



中华经典诗话

词品

〔明〕杨慎撰 高林广评注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词品/(明)杨慎撰;高林广评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9.1
(中华经典诗话)
ISBN 978-7-101-12408-8

I.词… II.①杨…②高… III.词(文学)-文学研究-中国-古代 IV.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08999 号

书 名	词 品
撰 者	[明]杨 慎
评 注 者	高林广
丛 书 名	中华经典诗话
责任编辑	宋凤娣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8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180 千字
印 数	1-8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12408-8
定 价	38.00 元

前言

一

杨慎（1488—1559），字用修，号升庵，新都（今四川成都）人。“幼警敏，十一岁能诗。十二拟作《古战场文》《过秦论》，长老惊异。入京，赋《黄叶诗》，李东阳见而嗟赏，令受业门下。”（《明史·杨慎传》）武宗正德六年（1511）殿试第一，授翰林修撰。参预修撰《武宗实录》，秉性刚直，事必直书。武宗微行出居庸关，抗疏切谏。世宗立，充经筵讲官。嘉靖三年（1524）廷臣“议大礼”，杨慎等三十六人上言抗谏，背旨，受廷杖，贬云南永昌卫。自此以后，或归蜀，或居云南会城，或留戍所，达三十余年之久。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卒于戍所。隆庆初，赠光禄少卿；天启中，追谥文宪。

杨慎渊雅博丽，著述颇丰。《明史·杨慎传》称：“明世记诵之博，著作之富，推慎为第一。诗文外，杂著至一百余种，并行于世。”其诗文作品主要见于《升庵集》八十一卷和《遗集》二十六卷中。存诗二千三百余首，其诗雄浑蕴藉，工致绮丽，清沈德潜《明诗别裁集》评价说：“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，宏博绝丽之学，随题赋形，一空依傍，于李（梦阳）、何（景明）诸子外，拔

戟自成一队。”又有《升庵长短句》三卷，《升庵长短句续集》三卷，存词三百四十余首，明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评价其词曰：“杨状元用修，好入六朝丽事，似近而远。”长短句创作之外，杨慎尚有不少词学著作，如《词品》以及词选《百琲明珠》《词林万选》等，另外，他还评点过《草堂诗余》。因此，杨慎是集作词、论词、选词、评词为一身的著名词学家，被王世贞誉为“词家功臣”。其中，尤以《词品》影响最大。

《词品》为通代词学论著，论析范围从六朝迄于明代。全书辨析文理，研讨正变，考订名物，论次字句，涉及词的源起、词体特性、词人故实、词作品鉴、风格兴寄、韵律字词等众多内容。清李调元《雨村词话序》评为：“吾蜀升庵《词品》，最为允当，胜弇州之英雄欺人十倍。”清吴衡照《莲子居词话》卷二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：“杨用修《词品》四卷，论列诗余，颇具知人论世之概，不独引据博洽而已。其引据处，亦足正俗本之误……其他辨订，渊该综核，终非陈耀文、胡应麟辈所可仰而攻也。”

《词品》是在杨慎远谪滇南时完成的，由于地处荒蛮，闻见有限，加之资料稀少，检阅不便，致使书中出现了不少讹误。对此，明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、陈耀文《正杨》多有指摘，清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也曾指出：“杨升庵《词品》六卷，补遗一卷，中记刘子寰、马子严、冯艾子，皆以名为字。张仲宗又专举其字，而失记其名，殊误。谓词名多取诗句，虽历历引据，率皆附会，屡为《笔丛》辨驳。”此外，《词品》又大量摘录、抄袭宋元人著述，这部分内容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，这也使后人对《词品》的价值产生了疑议。

二

尽管《词品》存在较多的舛谬和不当，但总体看来，仍然具有较高的词学价值，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。清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在指摘《词品》之失的同时，也客观地指出：“然大体极有可观。盖升庵素称博洽，于词更非门外道黑白。”吴梅《词学通论》也讲过：“《词品》虽多偏驳，顾考核流别，研讨正变，确为他家所不如者。”

《词品》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较多，现择其要者简单归纳如下。

（一）论词的起源

关于词的起源，文学史上有源于《诗经》、源于乐府、源于唐教坊曲等说法。杨慎认为，词源于六朝，其《词品序》开宗明义指出：“诗词同工而异曲，同源而分派。在六朝，若陶弘景之《寒夜怨》，梁武帝之《江南弄》，陆琼之《饮酒乐》，隋炀帝之《望江南》，填词之体已具矣。”杨慎所列诸篇均为诗，与后世真正意义上的由乐定辞、依曲定体的词体尚有很大差异。不过，这些诗在句式、结构、韵律、格调等方面确与词有相似之处。如，南朝梁陶弘景《寒夜怨》间用长短句，句式参差错落，从形式上看确与词体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；此外，该诗情致婉媚，冲淡秀洁，与后世词特别是婉约词具有相似的内容情趣和格调气韵。再如，梁武帝之“改”西曲，“制”《江南弄》，与后世的“依声填词”有相似之处；《江南弄》六首，中用叠句，这有其音乐上的缘由和作用；而大量和作的出现，则是在完全遵循原有曲调、韵律形式的基础上进行，这又与后世的依曲填词相类。又如，南朝梁陈陆琼《还台乐》属六言古体诗，

从体式上看，唐五代《破阵乐》六言八句一体，《何满子》六言六句一体，确与陆琼《还台乐》颇多接近。因此，杨慎讲：“填词起于唐人，而六朝已滥觞矣。”（卷一《梁武帝〈江南弄〉》）

《词品》卷一从词调缘起、句式变化、故实纪传、诗词关系、韵律形式、字源词典、风华情致等方面多方考论了词与六朝文学的关系。杨慎认为，词之源在六朝；不仅如此，“大率六朝人诗，风华情致，若作长短句，即是词也”（卷一《王筠〈楚妃吟〉》），其中一些观点，对于考察词的历史与递嬗痕迹有重要的参鉴意义。如，《穆护砂》乃“隋朝曲也。与《水调》《河传》同时，皆隋开汴河时，词人所制劳歌也”（卷一《穆护砂》）；梁简文帝《春情曲》为“唐律之祖”，“唐诗《瑞鹧鸪》格韵似之”（卷一《梁简文〈春情曲〉》）等。杨慎所论，虽时有舛误，但亦能自成一家，在中国词学史上影响巨大。受杨慎影响，后世持相似观点者为数不少。例如，明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：“词者，乐府之变也。昔人谓李太白《菩萨蛮》《忆秦娥》，杨用修又传其《清平乐》二首，以为词祖。不知隋炀帝已有《望江南》词。盖六朝诸君臣，颂酒赓色，务裁艳语，默启词端，实为滥觞之始。”清刘熙载《词概》：“梁武帝《江南弄》、陶弘景《寒夜怨》、陆琼《饮酒乐》、徐孝穆《长相思》，皆具词体，而堂庑未大。至太白《菩萨蛮》之‘繁情促节’，《忆秦娥》之‘长吟远慕’，遂使前此诸家，悉归环内。”近代王国维《戏曲考源》：“诗余之兴，齐梁小乐府先之。”

（二）论词调的缘起与流变

词调（或称词牌）是填词用的曲调名。流传至今的词调名有一千个以上，每一个词调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体式要求。对词调来源的考释是词学研究的重

要内容,《词品》对这一问题多有涉及。

杨慎认为,词调名多来自古人诗句。杨慎“掇拾古语以牵合词调名义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二〇〇《填词名解》“提要”),对《蝶恋花》等众多词调的来源进行了推考。例如,“《蝶恋花》则取梁元帝‘翻阶蛱蝶恋花情’。《满庭芳》则取吴融‘满庭芳草易黄昏’。《点绛唇》则取江淹‘白雪凝琼貌,明珠点绛唇’。《鹧鸪天》则取郑嵎‘春游鸡鹿塞,家在鹧鸪天’。《惜余春》则取太白赋语。《浣溪沙》则取少陵诗意。《青玉案》则取《四愁诗》语”(卷一《词名多取诗句》)。再如,《踏莎行》本韩翃诗“踏莎行草过春溪”(卷一《踏莎行》)等。杨慎从文学史料着手,侧重于探讨词调与魏晋唐人诗歌创作的渊源关系。由于缺少翔实的文献依据,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和辨析,杨慎所作出的判断和所得出的结论,往往显得感性有余而理据不足。不过,此中却贯穿了杨慎“诗词同源”的思想。从一定意义上讲,这一观念体现了杨慎对词体地位的尊崇和肯定。

诗之外,杨慎又以为有些词调出于魏晋及唐人的史志、笔记、小说甚至佛典等。例如:“唐人小说《冥音录》,载曲名有《上江虹》,即《满江红》。《红窗影》,即《红窗迥》也。”(卷一《〈上江虹〉〈红窗影〉》)再如:“西域诸国妇人,编发垂髻,饰以杂华,如中国塑佛像璎珞之饰,曰菩萨鬘,曲名取此。《唐书》吕元济上书,‘比见方邑,相率为浑脱队,骏马胡服,名曰苏幕遮’,曲名亦取此。李太白诗‘公孙大娘浑脱舞’,即此际之事也。”(卷一《〈菩萨鬘〉〈苏幕遮〉》)《词品》还多从乐曲名物、韵律特点等探讨词调的渊源与特点,这些考释为后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直观的史料参照,具有重要的词学

价值。

名称之外,《词品》对于词调与内容的关系多有解释。杨慎承续宋黄昇《花庵词选》“唐词多缘题所赋”的论点,认为唐代词调多与词作所写内容相一致。例如,南唐李后主《捣练子》“即咏捣练,乃唐词本体也”(卷一《捣练子》);宋王晋卿《人月圆》“即咏元宵,犹是唐人之意”(卷一《人月圆》);“《临江仙》则言水仙,《女冠子》则述道情,《河渚神》则咏祠庙,《巫山一段云》则状巫峡。如此词题曰《醉公子》,即咏公子醉也”(卷一《醉公子》)。不过,词调的来源和产生又是比较复杂的,并不是每一个词调和所咏内容之间都存在着必然的关联。有鉴于此,杨慎又论析了“借腔别咏”的问题。例如,《干荷叶》曲本该咏荷,但刘秉忠却用此调写出吊宋之作,杨慎认为“此借腔别咏,后世词例也”(卷一《干荷叶》)。杨慎的考论符合词体创作的演变过程,对于进一步认识词体的演变过程具有积极意义。

(三) 论词体特性

词在诞生之初,就有比较明显的香艳性、缘情性、柔媚性等特点,其基本功能是遣兴娱宾,而不是言志抒怀。这一点有别于诗,因此,词又称为“诗余”。其后,词的表现范围日渐扩大,词的功能和作用更趋丰富,人们对词体特性的体认也各有侧重。杨慎对慷慨清拔、匡时济世之作持赞赏态度,不过,相比之下,他更喜欢风华情致、约情合中一类词作。杨慎论词主“情致”,这在《词品》中多有体现,如卷一《王筠〈楚妃吟〉》曰:“大率六朝人诗,风华情致,若作长短句,即是词也。”卷二《莲词第一》中,杨慎评欧阳修咏莲花词“情思两极”,故而推为“古今莲词第一也”。卷三《林和靖》以“甚有

情致”评林逋《长相思》一词。卷三《韩范二公词》评韩琦和范仲淹曰：“二公（韩琦、范仲淹）一时熏德重望，而词亦情致如此。大抵人自情中生，焉能无情，但不过甚而已。宋儒云：‘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，欲之所以益炽也。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，情之所以益荡也。圣贤但云寡欲养心，约情合中而已。’”拾遗《于湖〈南乡子〉》评朱熹曰：“则晦翁于宴席，未尝不用妓。广平之赋梅花，又司马公亦有艳辞，亦何伤于清介乎？”

杨慎所处的时代，理学统治文坛，复古之风大盛。在理学家看来，情欲与天理水火不容，“情之溺人也甚于水”（宋邵雍《伊川击壤集序》）。词以抒写情性为主，自然就受到了理学家的轻视和排斥。但在杨慎看来，“大抵人自情中生，焉能无情”（卷三《韩范二公词》），因此，词中抒写情致是合情合理的；不独六朝作品多风华情致，宋代欧阳修、韩琦、范仲淹、朱熹词等也概莫能外。杨慎批评了禅家的“绝欲”说、道家的“忘情”说和理学家的“禁欲”论，突出强调了词的抒情功能。实际上，这也是对词的历史地位和文学特性的充分肯定。在理学盛行、扬理抑情的文化背景下，此论亦明显包含了对理学及其思想主张的批判和反驳。其后，明代中后期主情、尊情之说大盛，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思潮，并直接推动了文学的发展。如，明徐祯卿主张“因情立格”（《谈艺录》），明李梦阳讲“真者，音之发而情之原也”（《诗集自序》），“前后七子”“公安三袁”、李贽、冯梦龙、汤显祖等，都莫不强调情的地位和价值。杨慎一方面强调了情之必有和词中写情之必然，另一方面又主张“不过甚”，要“寡欲养心”“约情合中”，这实际上是对传统儒学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等观念的继承。

(四) 论词人品行、学识与词作的关系

《论语·宪问》曰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”有德之人一定会有出色的言论，有出色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，因此作家的品行学养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卷二《曹元宠梅词》一则曰：“徽宗时禁苏学，元宠（曹组）又近幸之臣，而暗用苏句，其所谓掩耳盗铃者。噫，奸臣丑正恶直，徒为劳尔。”曹组是徽宗的文学侍臣，“以占对开敏得幸”（《宋史·曹勋传》），确为“近幸之臣”；杨慎崇尚苏轼其人、其作，又鄙薄曹组之为人，因此才有“掩耳盗铃”“奸臣丑正恶直”之评。卷三《初寮词》讲，王安中“初为东坡门下士，诗文颇得膏腴。……其后附蔡京，遂叛东坡，其人不足道也”。王安中曾拜苏轼为师，登第后，又以弟子礼事苏门中人晁说之。但王安中显贵之后，对于求学晁说之一段经历却颇为忌讳；又谄事蔡京父子，品行轻薄。因此，杨慎言“其人不足道也”。对于那些清标玄致、英英独照一类词家，杨慎又极力推许，褒扬有加。如其评张元幹曰：“以送胡澹庵及寄李纲词得罪，忠义流也。”（卷三《张仲宗》）杨慎对张元幹词中的英雄之气、悲愤之情大为嘉许，认为虽然其词不甚工，但“忠义”可嘉，“亦当传”“宜表出之”。再如，其评王迈曰：“实之盖进则忠鲠，退则豪侠，元龙、太白一流人也。可以补史氏之遗。”（卷四《王实之》）杨慎引刘克庄《满江红·送王实之》词及《宴吉倅王实之》文，对王迈的才性、气质、政治品节等予以了高度评价。又如，其评刘辰翁《宝鼎现》曰：“此词题云‘丁酉’，盖元成宗大德元年，亦渊明书甲子之意也。词意凄婉，与《麦秀歌》何殊！”（补《刘会孟》）对刘辰翁的政治品节大为推许。

品行之外，杨慎对词人的学识亦多有强调。如卷一《欧苏词用选语》曰：

“填词虽于文为末，而非自《选》诗、《乐府》来，亦不能入妙。”主张词人应多研读《文选》《乐府诗集》等古代典籍，缀修前续，斟酌古语，取其精华，以此来增长才识，使词作臻于妙境。卷二《邱长春梨花词》曰：“天上无不识字神仙，世间宁有不读书道学耶？”此论意在褒扬邱处机学识渊博、勤于著述；同时，也对“束书不看”、妄言玄理者提出批评。卷三《张仲宗词用唐诗句》曰：“词虽一小技，然非胸中有万卷，下笔无一尘，亦不能臻其妙也。”对张元幹词化用唐人诗意的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，在杨慎看来，胸中万卷是张元幹“填词最工”的重要表现。《词品》中对苏轼、秦观、辛弃疾等人词作中的用典、用韵乃至用语情况都进行了大量的考证。其中，既见出了诸家的天才高朗，亦体现了杨慎的博洽。同时，从一定意义上讲，又是对“前七子”之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观念的反驳。

（五）论词的风格情调

与其对词体特质的体认有关，杨慎对风情婉致、绮丽娴雅一类词作情有独钟。在他看来，“风华情致”之格最符合词之本色。因此，他对《花间》《草堂》一类笙歌流觞、绮媚婉错之作持肯定和赞许态度。《词品》卷一以“风致婉丽”评隋炀帝《夜饮朝眠曲》，实际上，旧传隋炀帝所写的这两首诗浓艳靡丽、婉变务情，与六朝宫体无异。在一般人看来，这类作品柔媚近俗、绮语惑人，但杨慎却依然予以了很高的评价，这明显地反映了杨慎的词学倾向。拾遗《于湖〈南乡子〉》曰：“广平之赋梅花，又司马公亦有艳辞，亦何伤于清介乎？”唐宋璟《梅花赋》风流富艳，有南朝徐、庾宫体之风；宋司马光《锦堂春》一词亦有“笙歌丛里”“青衫湿透”之咏，侧艳柔媚。在杨慎看来，这并无损于二

公之高名。杨慎尊崇词体的本色与特质，因此对情致婉媚、蕴藉风流一类作品深为赏识。

不过，杨慎论词并不专主一格，举凡冲淡秀洁、安雅清贍、雍穆中远、沉雄笃挚等，只要约情合中、篇句相称，杨慎都是赏识的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的认识又是通脱的。例如，卷二《闲适之词》通过列举宋傅大询《水调歌头》、宋黄昇《酹江月》、元刘因《风中柳》以及宋吕本中《满江红》共四首“闲适”类词作，表现出了对冲淡娴雅、淳朴明秀一类作品的喜好。这几首词多以茅屋、寒梅、疏竹等自然景物为主要描写对象，大有陶渊明、孟浩然的风格意趣。杨慎讲：“每独行吟歌之，不惟有隐士出尘之想，兼如仙客御风之游矣。”卷三《潘逍遥》一则，评潘阆“其人狂逸不检，而诗句往往有出尘之语。词曲亦佳”。潘阆以狂疏不羁、率性自适著称，所作清古警迈、放意玄远，杨慎对此种情调也深为叹赏。

《词品》对忠愤悲慨之作多所论析，显示了杨慎对此类作品的重视。例如，卷一释《六州歌头》曰：“本鼓吹曲也，音调悲壮。又以古兴亡事实之，闻之使人慷慨，良不与艳词同科，诚可喜也。”卷五论陆游《鹊桥仙》感旧词“英气可掬，流落亦可惜矣。”宋岳珂有《祝英台近》（澹烟横）一词，杨慎称赞其“感慨忠愤”，可与宋辛弃疾“千古江山”一词相伯仲（卷五《岳珂〈祝英台近〉词》）；元刘秉忠有《吊宋》之作，杨慎称许曰“凄惻感慨，千古之寡和”（卷一《干荷叶》）。其他如以“雄壮”评宋葛长庚《武昌怀古词》、以“慷慨悲壮”评宋李冠《六州歌头》、以“悲壮可传”评宋孙浩然《离亭宴》、以“感慨之词”评元徐一初《摸鱼儿》和《登高词》等，都显示了杨慎对雄奇悲慨一

类风格的崇尚。

此外,《词品》还对“以俗为雅”“微言兴寄”“使事用典”等词学核心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,所论虽不够系统和全面,但片言警策,时有发明,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。《词品》还大量涉及了词的立意命题、句法结构、用韵方式、炼字炼句、名物考释等,这些内容,本书在“注释”和“评析”部分作了一定的归纳和分析,这里不再赘述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词品》对一些作品的选录和考订,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,有些则成为后世相关研究的原始文本依据。例如,宋陆游的《莺花亭》一诗、宋杜旂的《酹江月·石头城》等三词、元鲜于枢的《念奴娇·八咏楼》一词、元滕斌的《瑞鹧鸪·赠歌童阿珍》一词、明花纶的题杨太真画图《水仙子》一词等,均首见于《词品》。因此,《词品》的选录起到了留存古籍的重要作用。

三

据杨慎《词品序》,《词品》的成书时间是在嘉靖三十年(1551)仲春。其刊行时间是在嘉靖三十三年(1554),前有周逊序及杨慎自序。这是《词品》最早的刻本,人称“嘉靖本”。其后,明清两代出现了《词品》的众多刊本和影印本,如刘大昌珥江书屋本、陈继儒校订本、顾起元校刊本、程好之天都阁刊印本、李调元函海本等,其中又以李调元本影响最大,人称“函海本”。1960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幼安校点本,但仍有不少舛误。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修订本据嘉靖本辑入,并对王幼安校点本之

讹脱加以补正，此本遂成为现传《词品》中最权威、最通行的本子。此本六卷，“拾遗”一卷，另有陈秋帆“词品补”四则。

本书即以《词话丛编》本为底本，除个别标点等依据通行本及现行通用规范做了一定的改动外，其余文字、小注等一仍其旧。

《词品》不独内容丰富，而且篇幅也较长，全书有三百二十四则，近六万字。为与“中华经典诗话”的整体编写体例保持一致，我们精选了其中的一百则，并予以注释和评析。在篇目遴选上，除考虑内容的精粹性、典型性外，还适当顾及了原书结构的完整性和均衡性，于各卷及拾遗、补各部分中分别选录了一些代表性篇目。所选篇目均独立成篇，内容上不作删减，以保持其完整性。同时，保留了原有的篇名，并依据前后顺序统一加了序号。

选篇方面，本书大致遵循以下原则：

一、抄录他文者不选。《词品》大量引述《花庵词选》《吴礼部诗话》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《齐东野语》《能改斋漫录》等前人著述中的论点和内容。在摘录前人言论时，《词品》多不注文献来源或出处。有的系通篇照搬，有的对字句稍作改换，有的则是糅合、拼接几种文献而成，这部分内容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。例如，卷三共四十五则，其中有二十则出自《湘山野录》《吴礼部诗话》《草堂诗余》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《打虱诗话》《敬乡录》《夷坚志》等他人著述；卷六共二十三则，其中出自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和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者就达十八则之多，另有两则出自《吴礼部诗话》，因此本卷中真正属于杨慎“原创”者，只有三则。拾遗一卷十六则，其中有十四则出自《山房随笔》《古杭杂记》《苕溪渔隐丛话》等一些著述中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明胡应麟《少室山房

笔丛》、明陈耀文《正杨》等早有指摘。现代人的一些著作和论文，如唐圭璋《词话丛编》、岳淑珍《杨慎词品校注》、张仲谋《杨慎〈词品〉因袭前人著述考》（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08年第4期）、张静《评点与词话——杨慎评点〈草堂诗余〉与撰著〈词品〉之关系》（《中国韵文学刊》2008年第2期）、罗忼烈《杨慎〈词品〉多纰漏》（《重庆师院学报》1994年第1期）等均有举列和分析。这部分抄录之作，并不能代表《词品》的独特学术价值，因此，本书不予选录。

二、全篇存在明显错误且理论意义不大者不选。如卷三《李邦直》：“李邦直与东坡同时人，小词有：‘杨花落。燕子横穿朱阁。苦恨春醪如水薄。闲愁无处着。’绿野带红山落角。桃杏参差残萼。历历危樯沙外泊。东风晚来恶。”此贺铸词，杨慎误记为李邦直词。再如，卷二《三弦所始》：“今之三弦，始于元时。小山词云：‘三弦玉指，双钩草字，题赠玉娥儿。’”实际上，“三弦”不始于元，新、旧《唐书》《宋史》等文献中就屡有记载。类似的情况在《词品》中并不少见，本书一般不予选录。至于虽有纰漏、但尚具一定词学价值的条目，则另当别论，本书酌情选录并进行了一定的说明和评析。

三、篇幅短小、内容简单，词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不大者不选。如，卷一《乐府用取月字》：“子夜歌‘开窗取月光’，又‘笼窗取凉风’，妙在‘取’字。”再如，卷四《易彦祥》：“易祓，字彦祥，长沙人，宁宗朝解褐状元。《草堂》词《蓦山溪》‘海棠枝上，留取娇莺语’，其所作也。”这些篇目，或评述字词，或摘引文句，与词作及词论关系不大，词学意义有限，因此，不予

选录。

除上述情形外,《词品》真正有价值的论述大概有一百五十则。因此,本书所选之一百则,基本上能体现出《词品》的独特面貌和词学价值。对于一些不可不谈的重要篇目,本书则采用合论的方式,在对相似问题进行分析时附带引出,并加以一定的说明。

选文之外,本书还包括“注释”与“评析”两部分。“注释”方面,侧重于对原文中所涉及的作家、作品、名物、事典、文献及疑难字词等的疏解和说明。有异文者,参照公认的权威版本予以适当列举。考虑到丛书的编写体例和篇幅限制,注释尽量做到清晰明了、言简意赅。为使读者更直观、全面地了解《词品》内容,避免翻检之劳,依据本丛书的统一要求,注释中还引录了不少重要的诗词作品,尤其是词作品。这些作品均来自本集或公认的权威选集、总集,如《全宋词》《全金元词》等。“评析”部分则对选篇内容进行概括说明,分门别类、剖判源流,重点在于对重要理论观点的分析和辨证。有的观点,仅为一己之见,未必妥帖,不当之处,肯请方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。限于闻见和学识水平,书中一定还有不少的纰漏和错误,也请读者不吝赐教!

本书在编写过程中,得到了中华书局宋凤娣博士的帮助,在此谨致谢忱!

高林广

2015年3月